

台湾地区
公民教育发展
中
“文化认同”变迁之
研究
(1945—2008)

尚红娟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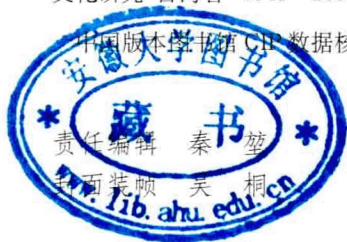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台湾地区公民教育发展中“文化认同”变迁之研究
1945~2008/尚红娟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

ISBN 978-7-208-12305-2

I. ①台… II. ①尚… III. ①中华文化-公民教育-
文化研究-台湾省-1945~2008 IV. ①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07774号



台湾地区公民教育发展中“文化认同”变迁之研究(1945—2008)

尚红娟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江苏启东人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3 插页 2 字数 297,000

2014年8月第1版 2014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8-12305-2/G·1673

定价 40.00 元

序 一

这是尚红娟国家课题的最终研究成果。她通过对 1945 年以来台湾地区公民教育发展过程的全面考察,引导人们关注台湾光复以来公民生活方式、社会规范、文化习惯以及价值取向的变化,特别是其文化认同、国家认同乃至政党认同的变迁,由此说明为什么必须高度重视深化两岸文化交流,应当怎样积极有效地推进两岸文化交流。在其博士后导师桑玉成教授的指导下,她不仅非常认真地研究了各种相关文献,而且非常主动地对两岸各种相关人士做了十分广泛的采访,因此,这项研究成果较之先前许多论述有明显的突破。

1895 年“马关条约”签订后,台湾地区为日本所强占。日本在台湾不遗余力地推行所谓“皇民化”教育,竭尽全力图谋扼杀台湾人民对中国文化的认同。然而,在台湾志士

仁人和广大民众中,对中国的国家认同,对中华民族的民族认同,对中华文化的文化认同,根深蒂固,很难撼动。这是 1945 年台湾回归祖国坚实的内在根柢。当然,日本军国主义长达半个世纪的“皇民化”即奴化教育,流毒与影响也不可低估。正因为如此,国民党当局在台湾地区所实行的公民教育,包括“国语运动”、“加强民族精神教育运动”、“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等,尽管具有强烈的党化教育和政治功利主义色彩,在积极推进台湾民众的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文化认同方面,不容否认,具有相当大的正面效能。

“台独势力”的滋生和膨胀,有着复杂的内外根源。一些国家总希冀将台湾地区从中国分裂出去,一直在支持和纵容这股势力。而国民党当局在公民教育中所贯穿的政治功利主义,脱离实际,以及现代性很大的缺失,又为这股势力兴风作浪提供了可乘之机。这股势力利用他们所掌控的权力,在教育领域千方百计地推行所谓“去中国化”运动,就是想淡化乃至根除台湾民众对中国的国家认同,对中华民族的民族认同,对中华文化的文化认同。

我于 1993 年 3 月至 6 月,受“中华文化复兴总会”秘书长黄石城之邀,首访台湾。在此之前,从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开始,在上海,已多次接待到过访的台湾各界朋友。两岸关系如何在曲折中一步步向前发展,可以称得上是一个亲历者、见证者。今天,两岸“三通”已成现实,人员往来就大多数人而言,已没有多少障碍,经济贸易关系及相应的行动,更是任何势力都无法逆转的。而最值得珍惜的,则是两岸人们相互之间亲情、友情、同胞之情的增进,知识的沟通和智慧的互补,彼此同情的理解逐步加深,互信逐步建立。

我以为,在两岸关系中,相较于经济贸易关系、政治法律关系而言,包括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文化认同在内的文化关系,乃

是最为根本的关系。两岸隔绝多年,政治上的分歧和长时间的激烈冲突,经济利益方面的不同诉求,教育文化发展上的不同方针,尤其是实现现代化的不同路径,现代性的不同体验,已导致两岸在价值追求、价值体系构成方面不容回避的许多差异。它们成为两岸关系顺利地进一步发展的严重障碍。消除这些障碍,仅仅凭借让与更大的利益,显然是不够的,它甚至会造成多方面的负面影响。两岸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文化认同上所出现的各种问题的解决,归根结底,还得依靠文化本身,依靠两岸文化各自的蓬勃发展和相互之间全方位的积极交流。

我认为,21世纪将是人文世纪。人文将是应对21世纪世界所面临的各种挑战的最坚韧最强大的力量。对历久而弥新的中华文化凝聚力及同化能力要有足够的自信。台湾文化其实就是闽台文化的一部分,根柢还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人之所以为人,当然离不开物质生活的保证,但更为根本的,仍是他们的文化内涵。如果不是那么急功近利,而是更多地关注所有人自身的全面发展,特别是他们人文方面的发展,那么,根植于中华文化无比深厚的底蕴,以及在借鉴和吸取当代世界各种文明优秀成果基础上现代性的培育、创造力的焕发,就有可能于无形中有效地解开历史与现实所造成的那些难以排解的心结,平息许许多多纠缠不清的利益纷争。

以上就是我的一点读后感。

姜义华

序 二

尚红娟的专著即将付梓出版,邀我写序。这是她所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青年项目的成果,作为作者博士后研究的合作导师自然非常高兴,因此非常乐于作一介绍。

广义上的公民教育是人的政治社会化的全部过程,而在人的政治社会化的全部过程及其结构之中,学校特别是高等学校的功能发挥处于关键性的地位。公民教育作为培养公民生活方式、社会规范、文化习惯和价值观的教育,首先在本质上是国家认同的教育。考虑到国家认同和新的民族认同的塑造,作为公民的教育就必须放在首位。所以,在所有的学校课程中,社会科课程或公民课程,是国家进行政治社会化、培养国家认同意识的核心课程,其传递、再造意识形态的作用更为显著。

作者以严谨的学术态度,强烈的现实关怀,借助于历史学、教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分析工具,通过对台湾地区学校公民教育从“西化”到“本土化”、从“中国化”至“台湾化”的发展历程做一全景式的纵向梳理,以此对其塑造“国家认同”、“文化认同”的功能、途径、效果及发展趋势进行了系统梳理和深入剖析。通读这部二十多万字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以下几个值得关注的地方:

一是深厚的历史感和清晰的历史逻辑。本书通过大量史料的梳理,追溯了台湾公民教育的历史,仔细探讨了发轫于清末的修身科,诞生于北洋末期单设的公民科,以及国民政府时期系统化了的训育科。1945年台湾复归中国版图,1949年年底国民党败退台湾,又带来了两大巨变:摆脱日本殖民统治,与大陆长期分离。至此,台湾地区的公民教育开始了自我的发展轨迹。不论是“戒严”时的“反攻复国”,还是“解严”后的“独立建国”,公民教育始终沦为当权者传递施政理念、构建文化霸权的政治工具。鉴于台湾地区的特殊性,台湾岛内的“国家认同”、“国家意识”自解严以来一直都是各方强烈争论的问题。“戒严”时期,台湾地区的“国家认同”是国民党政权灌输式,以“大中华主义”来教化台湾人民;随着“解严”后“民主化”的发展,台湾的“主体性”愈来愈受重视。统治阶层开始以“台湾主体意识”来取代“大中国意识”,成为统合行政机构的新指导思想。1996年李登辉成为台湾首任的民选地区领导人,政治定位主张改弦易张,由“中国认同”转向倡言“生命共同体”、“中华民国在台湾”;在意识形态的认知上,由“中国意识”转向“台湾意识”,1998年更提出“新台湾人”的主张;2000年民进党的陈水扁上台,公开提倡并宣扬以台湾为主体性的“国家认同”。

二是严密的理论分析。本书从公民教育的层面考察台湾地

区民众文化认同观的形成、演变及影响因素,就公民教育、国家认同、文化认同三者间的关系作了全面深入的剖析。教育是国家事业,国家可以运用教育的力量与手段来培养国民。国家通过教育可以达成政治社会化的目的。反映在学校课程上,就是强调“爱国家”、“爱民族”意识的形成,以及对国家民族和乡土的认同。每一个国家或地区都会在其既定的政策、目标和理想下,透过学校教育的历程,去塑造个体的政治信仰及政治人格,形成个体在政治行为上的定向和模式。在台湾当局高调干涉下,一套经过重新塑造的“共同文化”、或说是经过遗忘、刻意挑选的“共同历史记忆”,使得“台湾认同为优先”似乎成为主流趋势。但是,民众对于“台湾”这块地方,在政治、血缘、文化、历史等方面的认知与论述存有很大的差异。而且,因“缺乏认同意识的文化”及“模糊的主体意识”,或是基于教育中立,目前在教育上往往避谈台湾定位的问题。探讨“戒严”前后“国家认同”、“文化认同”在公民教育中的演变,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台湾问题”的本质,区分“中国意识”与“台湾意识”,“中华文化”与“台湾文化”的异同及其关联性。因此,“解严”后,台湾地区的“国家认同”由“中国认同”的大一统转向“台湾认同”大发展,由“中华文化”的绝对渗透到“台湾文化”的多元倡导。

三是强烈的现实意义和价值。本书不仅为全面了解台湾地区公民教育的发展提供借鉴与参考,为大陆公民教育发展政策研究提供经验与启示,而且为促进两岸公民教育互鉴与共同发展积累了基础性的成果,有利于两岸文教的深度交流与广泛合作。教育目前是两岸交往最活跃的领域,对台湾地区公民教育的研究为两岸在“陆生赴台”、“台生来陆”,两岸学历互认、学分互采,高校合作等重大紧要问题的推进中提供了重要的知识背景,有助于深入了解台湾地区民众,尤其是学子潜在的文化根基

和政治倾向等。同时也为台湾地区民众心理、知识构成与“国家观”的研究打下了良好基础。

四是大量有价值的访谈和交流。作者多次赴台访问,参与两岸文教方面有关的论坛,到多所台湾高校图书馆查找资料,去各地书店购买图书。与维多利亚双语学校、屏东教育大学附属试验小学的公民科教师及中小学生进行面对面的访谈,对来大陆短期交流的学生和大陆赴台交流生进行座谈,同台湾教育部门官员及行政部门要员、相关领域的教授专家,进行咨询和探讨,从中汲取了大量有价值的信息,这使本书的很多论述具有了现实感。

通过历史经验的交流与分享而进行的文化交流,是不断提升海峡两岸关系的重要途径。本书作者对台湾公民教育与文化认同的研究,有力推进了学界关于两岸关系的基础性研究,为达到上述目标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当然,本书侧重历史分析的分量还较多,而对文化认同及理论分析、对策建议未能充分展开,希望作者能进一步拓展国际比较的视野,提供更广阔的理论参照。并衷心祝愿作者以此为新的起点,在今后的研究中取得更好的成绩。

是为序。

桑玉成

目 录

序一.....	姜义华	1
序二.....	桑玉成	1
第一章 导言		1
研究目的		1
研究现状		6
研究意义		20
研究范围		21
研究内容		23
第二章 台湾地区公民教育的溯源		28
第一节 修身科的嬗变		28
第二节 公民科的设置		45
小结		62
第三章 民国时期公民教育的实施： 1923—1945		65

第一节 以塑造理想公民为内涵的知识教育 (1923—1927)·····	66
第二节 以灌输三民主义为目标的思想教育 (1928—1937)·····	85
第三节 以动员战时训练为中心的政治教育 (1938—1945)·····	104
小结·····	115
第四章 光复后台湾地区公民教育的回顾： 1945—1987·····	122
第一节 以“去皇民化”为中心的公民教育·····	127
第二节 以“反共复国”为目标的政治教育·····	139
第三节 以“民族精神”为内容的道德教育·····	156
小结·····	180
第五章 “解严”后台湾地区公民教育的进程： 1988—2008·····	183
第一节 “本土化”进程中公民科的变迁·····	185
第二节 乡土教育中的“母语教育”·····	213
第三节 本土教育中的公民教育·····	226
第四节 “主体性教育”中“认同教育”·····	241
小结·····	260
第六章 台湾地区公民教育与“文化认同”的变迁·····	263
第一节 台湾地区的“国家认同”与“文化认同”·····	264
第二节 公民教育·“中国认同”·中国文化·····	286
第三节 公民教育·“台湾认同”·台湾文化·····	324
小结·····	357
结语·····	360
参考文献·····	379
后记·····	399

第一章 导 言

研究目的

在两岸统一大业的各种障碍性因素中，文化认同是为关键性的因素之一。然而，也正如台湾文化总会会长刘兆玄所言，两岸在取得包括签订“ECFA”在内的经济层面的沟通成果以后，在中华文化这一基础上，两岸可以找到一条出路，“中华文化是两岸之间的最大公约数”。^①作为台湾的新生代，青少年文化认同观的形成受当局意识形态的严重影响，其主要的塑造途径之一则是由政府强势介入的公民教育，尤其是学校领域的公民科课程。因此，本书的两大重心：一是以大陆学者的视野对台湾地区公民教育的发展目标、内涵、效果以及具体的实施情况做

^① 刘兆玄：《中华文化是两岸最大的公约数》，2010年12月9日，《21世纪经济报道》。

一客观评价。二是从公民教育的层面考察台湾地区民众文化认同观的形成、演变及影响因素,就公民教育、国家认同、文化认同三者间的关系做一全面深入的剖析。

政治与教育总是相互影响,所以政府施政的各项发展多与其所主张的教育政策息息相关。^①而且,执政者也多会以其所掌握的资源来延续其政权,其中包括以教育方式实现统治者文化霸权的世界观以及形塑统治者政治理念在内。由此,学校教育的功能不只是传递知识与社会文化,更是与国家机器的统治结合,用以塑造民族意识、凝聚对国家机器统治正当性的认同。公民教育作为现代政治学和教育学相交叉的一个重要领域,其显著功能便是充当这一教育方式的载体。

自20世纪以来,世界各国大都重视公民教育。1992年召开的国际政治化和教育委员会就把公民教育作为大会的主题。目前,开展公民教育已成为世界教育发展的共同趋势。各国也纷纷在学校推行公民教育,以培养适合现代社会所需要的人才。有学者指出,公民教育的首要之务,“厥为处理整体内在核心机制所涉价值取向认知及其定位的问题”。因此,“就一个国家或地区而言,但凡遇到政党轮替、意识形态、社会变迁以及国际因素等外力的影响,学校的公民教育便会发生解构性的变化,即在课程内涵、概念论述、课程标准修订、教材编选及相关的课堂活动的设计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调整与重组”。^②

台湾地区的公民教育主要以学校既有的课程体系为主,无论是威权时期还是所谓的“民主化”时期,公民教育都沦为当局和当权者一味操纵利用的工具,更为塑造其意识形态的机器,确

① 林天佑等著:《教育政治学》,台北心理出版社,2004年,第1页。

② 庄富源:《转变中的台湾公民社会与公民教育——有关学校公民教育问题面向及其发展趋势之研究》,政治大学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博士论文,2006年。

立其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预设的价值认同,以达到稳固政权的政治目的。探讨台湾地区光复后公民教育的发展轨迹,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台湾当局如何介入教育,如何通过教育将其执政理念、意识形态的认同贯彻于台湾未来的公民。因此,关于台湾学校公民教育在“戒严”前后有哪些特征,两党轮替前后公民教育的发展轨迹,即课程目标、内涵及其教科书具体发生了哪些历史性的变迁,是否具有延续性、政治性等问题的研究,是本书的研究目的之一。

依照国家教育权的概念,教育是国家事业,国家可以运用教育的力量与手段来培养国民。国家通过教育可以达成政治社会化的目的。反映在学校课程上,就是强调“爱国家”、“爱民族”意识的形成,以及对国家民族和乡土的认同。每一个国家都会在其既定的政策、目标和理想下,透过学校教育的历程,去塑造个体的政治信仰及政治人格,形成个体在政治行为上的定向和模式。^①尽管台湾是中国的一个地方省份,鉴于其特殊性,台湾岛内的“国家认同”、“国家意识”自“解严”以来一直都是各方强烈争论的问题。“戒严”时期,台湾地区的“国家认同”是国民党政权灌输式,以大中华主义来教化台湾人民;随着“解严”后“民主化”的发展,台湾的“主体性”愈来愈受重视。统治阶层开始以“台湾主体意识”来取代“大中国意识”,成为统合“国家机构”的新指导思想。^②1996年李登辉成为台湾首任的民选地区领导人,政治定位主张更弦易张,由“中国认同”转向倡言“命运共同体”、“中华民国在台湾”;在意识形态的认知上,由“中国意识”转向“台湾意识”,1998年更提出“新台湾人”的主张;2000年民进党

① 林水波:《学校在政治社会化中的角色》,《思与言》第11卷第3期,第135页。

② 田弘茂、朱云汉等主编:《巩固第三波民主》,台北业强出版社,1997年。

的陈水扁上台,公开提倡并宣扬以台湾为主体性的“国家认同”。

在台湾当局如此的高调干涉下,一套经过重新塑造的共同文化,或说是经过遗忘、刻意挑选的共同历史记忆,使得“台湾认同为优先”似乎成为主流趋势。只是,民众对于“台湾”这块地方,在政治、血缘、文化、历史等方面的认知与论述存有很大的差异。而且,因“缺乏认同意识的文化”及“模糊的主体意识”,或是基于教育中立,目前在教育上往往避谈台湾定位的问题。探讨“戒严”前后“国家认同”、“文化认同”在公民教育中的演变,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台湾问题”的本质,区分“中国意识”与“台湾意识”,“中华文化”与“台湾文化”的异同及其关联性。因此,“解严”后,台湾地区的“国家认同”由“中国认同”的大一统转向“台湾认同”大发展,由“中华文化”的绝对渗透到“台湾文化”的多元倡导,期间,台湾当局是如何介入学校公民教育,实施效果是否吻合于预期目标。此为本书的研究目的之二。

学校教育中的课程与教学均系一种意识形态与文化霸权的合理化、合法化伪装的体现。国家认同是一个政治学的概念,教科书可谓政治社会化的输送纽带,所传达的是一种信念、价值,进而形塑行为的实践。在学校课程中公民科又是传递政治意识形态的主要载体。台湾地区公民教育的实施,以公民类科的教学与活动为主,而教科书是专为学生设计的书面材料,也是教师授课时的主要依据,更是教学目标的具体呈现,甚至有学者认为教科书是教材的权威,是教学方案的心脏;没有教科书就没有学校,应该教什么?要如何教?几乎完全取决于教科书。^①探讨公民类科教科书中所呈现的“国家认同”、“文化认同”内涵,将有助于我们厘清台湾地区的“国家认同”教育模式及其特征。因此以

^① Chambliss, M. J. & Calfee, R. C. (1999): *Textbooks for Learning*, London: Blackwell.

公民科领域的课程和教科书为中心,就学校公民教育在塑造中小学生的“中国意识”、“台湾意识”、“中华文化”以及“台湾文化”认同方面所发挥的显性和隐性作用,其可能产生的功能做一深入探究;此为本书的研究目的之三。

教育现象是一种文化现象,公民教育更是协助个体社会化的一种文化活动,公民教育必须让个体能适应其所生存的环境,从一个不具备社会经验的个体,成为一个拥有社会经验而能加以应用的社会文化个体。^①文化与社会关切,举凡社会关系的维持、伦理思想的建构、社会规范的形成,甚至社会生命的延续、社会经验的传承,均为文化生活的一部分,此与公民教育的范围十分吻合,涵盖个人、社会甚至国家的议题。而教育更是文化传承的基础,公民教育的价值即在帮助文化去芜存菁,将文化中的精华留存下来。公民教育的实施须依赖现有的社会、文化资产,在认知方面应具备基本的自然与社会知识,这些知识都是文化孕育的结果,亦为公民教育取材的来源。

文化认同是一种个体被群体的文化影响的感觉,是个体对于所属文化的一种归属感,主要表现在地理位置、历史、国籍(祖籍)、宗教信仰以及种族民族划分等方面。文化认同对于维护国家统一、标志民族特性以及塑造凝聚力、向心力等具有特殊意义。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和中国区别于其他民族和国家的基本特质,是中华民族的身份象征,文化认同是实现两岸统一的前提。“经济”和“文化”是现今两岸关系发展中的重要“桥梁”。胡锦涛曾指出,在当前的形势下,开展两岸文化教育交流“既有巨大需求和潜力,也显得更为重要”。贾庆林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上也再次强调“要增进台湾同胞对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

^① 徐宗林:《文化学与公民教育》,台湾师范大学学术研究委员会主编:《明日的公民教育》,台北幼狮文化公司,1983年,第191页。

的认同”。增进文化认同,拓展文化交流,强化归宿意识,是实现两岸和谈与统一的重要前提。

台湾光复以来,在人为的因素下,两岸在中华文化认同方面却出现了很大的差异。与此同时,由于台湾地区在经济、军事上完全依附于西方国家,尤其是美、日等国,台湾地区对西方文化的认同在这几十年里也不断强化。中华文化在台湾地区的认同日益削弱,“台湾文化”不仅与之分离而且对立。由此,公民教育被认为是一种文化霸权的灌输、意识形态的宰制工具而备受抨击。探讨文化认同在公民教育中的演变,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中华文化与“台湾文化”的异同,以及台湾地区民众文化认同多元化的实质。因此,客观分析台湾地区的公民教育对“台湾问题”的影响,造成两岸民众在文化认同上分离的因素,从而就两岸学子文化认同的增进,提出可操作性的建议与对策。此为本书的研究目的之四。

研究现状

国际社会关于公民教育的研究始于19世纪80年代。公民问题历来是政治和教育的核心问题。通过教育使社会个体成为合格公民,这是现代国家对个体发展最基本的期望,也是教育最基本的目标。1882年,法国率先开设了“公民训导”课;到19世纪末,德国教育家凯兴斯泰纳从理论上论证了“公民教育”的思想,1918年,德国政府以宪法的形式保障公民教育的实施。之后,培养合格的公民就逐渐成为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教育目标。随着世界政治经济的发展,公民教育概念已被各国所普遍接受,学界对于公民教育理论与实践的研究也逐步展开。